

宏观与微观双重视阈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初探

王 婷

【内容提要】 本文在生态危机根源论的资本逻辑和生产逻辑基础上，提出生态危机之人的内在发展本质逻辑，通过分析生态危机与人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强调作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生态危机之成因的综合复杂性，特别是强调在人的内在发展本质与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演化出的多维度、多层面和多角度的思考空间，以说明在资本逻辑指导下的宏观制度限制的基础上，同样需要在人的内在本质逻辑指导下的微观文化约束。

【关键词】 生态文明 宏观视阈 微观视阈

作者简介：王婷（1977- ），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生态危机作为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不只是文明问题，更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生存问题。它的核心问题不只在自由、民主、平等，更在于对生命的尊重、保护与升华；它的论域不仅限于人类文明，更在于整个生物圈的生存环境；它的理论背景不止于哲学，更在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跨领域的论域整合，甚至更需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融互动。时至今日，人类已由最初的生态关怀和零散的生态思想研究，步入系统化、理论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我们认为，生态危机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困境，绝非生产、资本、经济、政治等单纯宏观视阈下几个核心要素所能囊括的问题，在人类日常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个维度和每个角落同样潜藏着它的深层根基。人类更需要在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阈中，透过人的内在发展本质，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变迁中，展开关于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度、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建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利用资本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以宏观的制度维度限制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同样需要以微观的建制限制资本对自然力的掠夺。

一、宏观视阈中的生态危机根源论

在众多关于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是生态危机的资本根源论和生产根源论，生态危机的资本根源论和生产根源论警示人类应该理智地审视自身的有限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动态平衡。

生态危机的资本根源论认为，资本无限逐利的本性为维持扩大再生产制造虚假需求，导致消费

主义盛行，人们以占有为目的的高生产与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超出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资本根源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传统，找到了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社会根源，即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物”，它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与人的内在本质和社会生产逻辑密不可分。生态危机的生产根源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加重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爆发。生产逻辑的此种理解，将人类社会与自然间的冲突必然化，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简化为生产力单方面的罪责，并否定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依据马克思的社会三阶段论，作为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社会生产力，也存在发展的三个阶段。”^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源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完全，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外化表现为生态危机，伴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解决，生态危机将得到解除。生态危机的生产根源论片面强调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对立、忽视人与自然间的辩证统一，甚至将生态危机理解为社会生产无法克服的内在痼疾，将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社会进步相对立，将生态危机理解为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显然是错误的。

虽然生态危机的资本根源论和生产根源论警示人类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人与自然间的矛盾与冲突，提醒世人避免经济发展与生态恶化同时并存的尴尬局面，指出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社会根源，明确生态问题研究的两条主逻辑，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步入崭新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但资本根源论与生产根源论在潜心于宏观视阈的研究中，忽视了微观的研究范式，未能全面揭示生态困境的内在复杂性和多维性。

我们认为，生态危机不只根源于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也植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潜藏于人类的内在发展诉求，它是人类内在发展本质与资本逻辑和生产逻辑之间相互作用、互为推力的众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综合体。关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和生态问题的研究更需要透过人的内在发展本质，以宏观视阈与微观视阈的双重哲学范式，通过多维度、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细致剖析与深入探讨，才能找到人类社会生活内部各维度、各方面潜藏的引发生态危机的诸多因素。

二、宏观与微观双重视阈中的生态危机综合根源论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取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和外在规定。但在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资本逐利的本性将一切人的各个维度和层面的能力与素养囿于物质层面，忽视人类的精神需求，导致人类社会出现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片面发展。这就需要通过建构合理的制度体系，在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通过完善社会制度，丰盈人类的精神需求、健全人类的生活需求。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宏观的制度维度限制资本对人力的剥削和对自然力的掠夺，在生态学领域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在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面临被资本宰制和片面化发展的危险。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宏观维度的制度限制，还需要微观建制的文化约束，在宏观与微观的双重研究视阈中，开创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中国道路。

^① 胡莹：《生态危机视阈下的生产与资本》，《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8期。

1. 生态危机综合根源论之人的发展本质逻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人的类本质与现实本质相辅相成，类本质是现实本质的内在依据，现实本质是类本质的外化与现实化；类本质构成现实本质的内在引导与发展动力，现实本质丰富、充盈人的类本质。在内在类本质的感召下，人类通过扩大交往占有更多的社会关系，不断实现对自身生命限度的突破，拓展自身的发展程度。正是在人类发展本质的内在诉求推动下，人类不断增强自身的主体性、寻求内在本质的现实化，提升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新的生产关系得以形成。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人类的主体力量，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也使人类付出遗失全面发展的巨大代价，致使人类在拓展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这三种基本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单向度地发展了物质维度，过度膨胀的占有欲排挤了基本诉求，以致于人以异化的方式面向自然、面向他人、面向自身。这种异化在人的发展本质方面表现为现实本质对类本质的背离，使人类自身的发展呈现出类本质与现实本质相违背的“内在自反性”。人类内在本质发展的“自反性”构成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异化的一个内在根源，同样体现为生态危机根源论的又一逻辑。

2. 生态危机综合根源论之宏观与微观的双重研究视阈

人类自被抛掷到以否定形式面向自身的自然界的那一刻起，在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驱动下，拿起工具改造自然以获取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活资料。在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诞生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能力的提升。马克思认为，资本开启了人类的文明史，他将此前的一切人类历史称作“史前史”，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批判都是在肯定资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前提下展开的。他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

在人类利用资本扩大生产、发展自身的过程中，由于资本自身的逐利特性使人类偏离了初衷，坠入片面和极端的物欲追求，在自身被物化、被异化发展的同时，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统一被破坏。由此可见，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不只在于资本逻辑和生产逻辑，也根源于人类的内在发展诉求，它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类内在本质的发展诉求与资本的外在力量相结合的内外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人的内在发展本质逻辑、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三者之间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每一逻辑的自身发展都使另外两个逻辑得到强化，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彰显出生态危机综合根源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与微观的双重研究视阈。

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强调：“‘宏观’和‘微观’层面之间虽然存在着间距和鸿沟，但这并不意味着容许我们把其中的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二分开来，更不允许我们‘忽视’其中的某一个层面。不可还原性并不等同于截然分立。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对应性以及同源性。”^④生态危机的综合根源论，在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宏观研究范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④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2,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 p. 140.

式基础上，提出人之发展的内在本质逻辑，使生态文明建设在资本、生产与人的发展三种逻辑间的相互张力下呈现出隐藏在内部的微观研究视阈，使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内在的微观政治哲学范式得以显现。

三、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阈：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研究范式

马克思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是以他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具体微观剖析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宏观与微观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国内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既走入微观分析又走向宏观分析，相比较而言，传统意识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却只有走入没有走出。“传统意识哲学走入宏观视阈，而没有走出宏观视阈，所以陷入抽象化、体系化；后现代哲学走入微观视阈，却没有走出微观视阈，所以陷入断裂化、破碎化。”^① 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理论中不存在“抽象的”“大写的”人和“空泛”的理论，他运用宏观概括与微观分析相统一的理论范式，剖析和阐释各种具体的人及其生存境遇。

首先，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宏大叙事，建立在他对虚假需求和幻想欲望的微观分析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满足自身资本积累的目的，制造诱使他人追求新享受、做出新牺牲、陷入新破产的虚假需求，而虚假需求则“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②。

其次，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理论批判与他对工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批判紧密结合。马克思指出，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③。工人劳动的结果是使自己的生活赤贫、身体畸形、智力愚钝，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人类自由自觉的本质需要，而只是满足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以致于工人以动物的方式面向人的生活，“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④。

再次，马克思在谈论地租时，不仅从宏观视阈分析社会制度、土壤肥力和土地位置等核心要素对地租的决定性作用，还从微观视阈分析道路的开辟、交通工具的完善、人口数量的增加、原料和家畜价格的提高以及工业新发明的采用等非决定因素对地租的影响。

最后，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向度中，他也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人们城乡分离的生活方式两个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方面，马克思肯定安德森的级差地租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相分离，致使土地使用者在土地使用期间避免一切改良土地状况的资本投入，通过对土地肥力的消耗做到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另一方面，马克思以微观研究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城乡分离的生活方式，致使人畜排出的天然土壤肥料被浪费为环境污染物，致使以农产品形式被带走的土地养分无法获得补偿。

此外，马克思在谈论工资时，批判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仅仅当作工人而不是当作人来考察，他

① 赵福生：《论马克思的微观哲学视阈》，《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指出：“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① 在马克思关于人性解放道路的探寻中，他认为不能只考虑某个或某几个核心要素，应把全面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马克思研究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社会人，而非抽象的经济人。

基于以上理解得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中，并未将研究视角局限于生产、经济、政治等核心要素的宏大叙事，而是在宏观与微观的双重研究视阈中，将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核心要素与边缘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囊括在他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中。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就在于马克思不断地走入一走出，就在于微观哲学视阈与宏观哲学视阈的结合，这是多与一结合，是客观与主观结合，这表明马克思深谙并突显了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使命”^②。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③ 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实践活动创造人类历史，人类历史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展开，人类生存方式内在地包含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客观外在的既定与主观内在的超然、中心要素的洪流激荡与边缘要素的溪流浸润。以宏观与微观双重研究视阈对人类生存方式进行理论分析与现实批判，不仅能够为生态危机的资本根源论找到合理利用资本的理论出口，还能弥补生产根源论割裂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理论缺憾，从而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能够实现宏观视阈与微观视阈的交融合流，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抽象与现实具体的交流互动。“建立新的价值规范体系是克服危机的途径，其必然要实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终极目的。”^④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要“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⑤。显而易见，我国正在宏观与微观的双重研究视阈下，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 [1] 陈晓明：《中国正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2] 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3] 张奎良：《人的本质：马克思对哲学最高问题的回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 [4] 张春华：《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路径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制度维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

（编辑：张 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② 赵福生：《论马克思的微观哲学视阈》，《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④ 武卉昕：《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路径演变及范式转向》，《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6期。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